

# 近年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

◎奚密

## 序言

本文就一九九六年以來以英文撰述的台灣文學研究的成果，作一簡單的報告。在時間上，本文銜接應鳳凰女士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1997台灣文學年鑑》）。該文對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之歷史和九〇年代中期以前的重要著作都作了詳盡的介紹，無需重複。在地理範疇上，雖然本文的重點是美國，但是隨著英語的日益全球化，英文作為學術出版的語言也愈來愈普遍，在歐洲和亞洲都可以看出這個趨勢。因此，凡是在歐美出版的以英文寫作的相關著作，亦屬於本文的討論範圍。其次，除了正式出版的著作，相關博士論文和學術研討會代表了學術研究的另外兩種形式，因此下文也將提及。最後，台灣文學研究和文學文本當然是分不開的。在綜述英文研究狀況的同時，本文也對近年來的台灣文學英譯作一簡介。由於所涉及的資料形式多元，發表渠道分散，本文無法鉅細無遺的一一介紹。選擇性地綜合報告難免有遺珠之憾，敬請作者與讀者諒察。

相對於九〇年代前半，近四、五年來正式出版的有關專著闕如，但是這並不表示台灣文學研究在西方是沉默的；它主要分散在多種學術期刊和專書或論文集的個別章節裡。就期刊來說，又可分為中國文學、中國研究、美國主流文學文化等三類期刊，例如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香港嶺南大學出版的《中文文學學報》（*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屬於第一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屬於第二類；杜克大學的《疆界2》（*boundary 2*）和研究表演藝術的《戲劇評論》（*The Drama Review*）則屬於第三類。下面就文類和科目來分項討論。

## 一、台灣文學史和文學研究方法論

近一、二十年來台灣文學史研究既充滿生機，饒富新意，也不乏爭議性，眾聲喧嘩。張誦聖的〈超越文化與國族認同：當前對台灣日據時代皇民文學的重估〉（*Beyond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urrent Re-evaluation of the Kominka Literature from Taiwan's Japanese Period*）刊登在《中文文學學報》一九九七年七月的創刊號上。以皇民文學作為一面鏡子來考察當前台灣文學研究所面臨的挑戰。

該文首先簡述了台灣本土文學傳統的歷史，包括從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日據時代文學，戒嚴時代對本土文學的刻意壓抑，鄉土文學運動（1977~78）和台灣意識論戰（1983~84）以降對本土化的積極推動，以至九〇年代本土意識如何成為文化主流。文學論述的本土化當然和政治民主進程是分不開的，

但是它們的目標不同。前者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集體記憶和文化象徵來塑造集體認同。在這個重構文學史的過程裡，皇民文學是一個敏感的議題。

張誦聖認為近年來的皇民文學研究標誌三種不同的角度：(1)研究者譴責皇民作家的「叛徒」心態，但是努力從作品是否暗含顛覆意義來釐清真假「叛徒」；(2)認為皇民作家是在無所選擇的情況下為殖民者宣傳的，情有可原；(3)視皇民化為殖民者長期日化政策的濃縮版，作家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為「皇民化的英雄式修辭所吸引」，另一方面又不滿「殖民者的歧視行為」（頁八八）。在讚美台灣學者紮實的史料工夫的同時，作者指出他們的文本解讀多半不夠深刻，往往只著眼於作品的題旨，並以此對作家作出終極的道德判斷。許多學者忽略了價值信仰系統落在歷史語境的相對意義。反諷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裡，學者們一再警惕的是道德立場構成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大阻力。在積極建立台灣文學之自主性的過程裡，台灣學者似乎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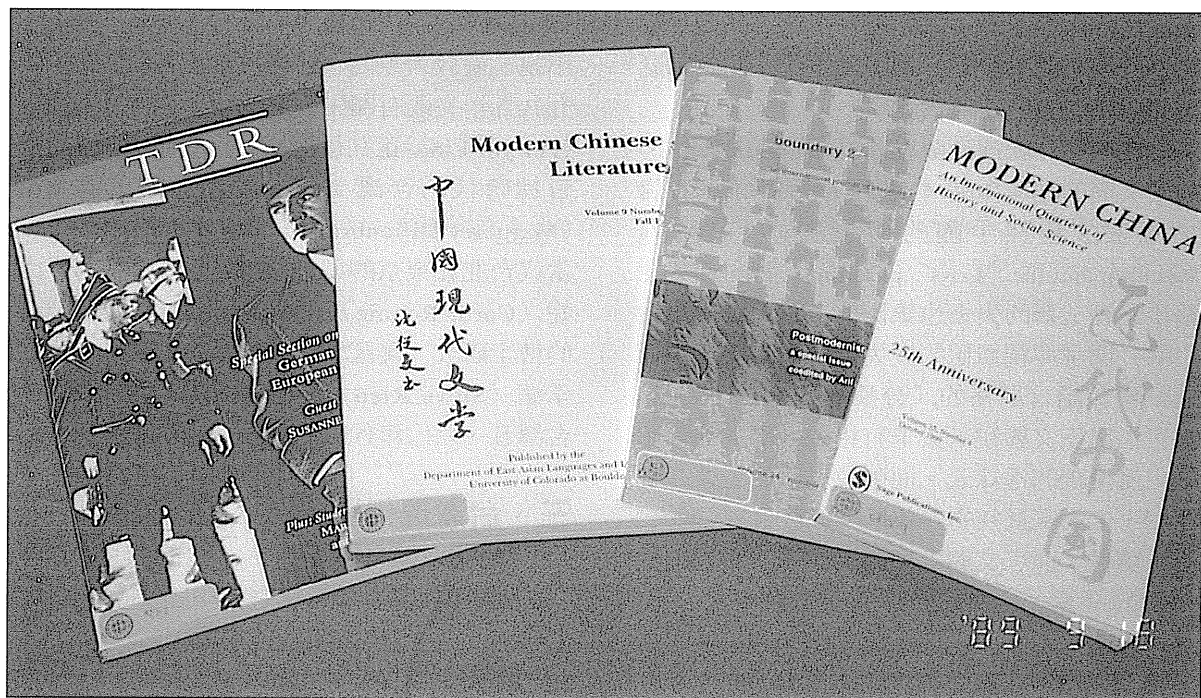
相對於主題先行和道德掛帥的目的論，作者提出另一個詮釋角度：個別作家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其主要依據是法國社會學家布狄厄（Pierre Bourdieu）關於文化生產和文學場的理論。張誦聖強調的是，在特定的時空裡作家如何獲得和利用文化資本來爭取及鞏固己身在文學領域裡的地位。她的結論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文學成規、美學前提、語言媒介等是多元而複雜的，它遠非單一的政治議題可挪用的。台灣文學的特色之一正是它的雜揉性和（相對於國族文學）偏離性。

文學論述與政治議題之間的糾葛，國族主義和文化純粹論的局限，也是唐小兵所關注的。他的〈論「台灣文學」之觀念〉（On the Concept of Taiwan Literature）一文發表在《現

代中國》一九九九年十月號上。作者認為八、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界環繞「台灣文學」此觀念所進行的持續爭論充滿了激情和焦慮，稱得上是當代華文世界裡鮮見的一場辯論。作者甚至認為它的長遠意義不下於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該文按時間順序綜述了八〇年代初對立的「台灣結」和「中國結」如何浮上檯面，以至九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中期為止）對此議題比較深入、多元，也更尖銳的討論。

該文平實地討論了「台灣文學」這個觀念的複雜性和曖昧性。對台灣文學自主性和本土性的訴求，基本上他採取同情的態度。（結尾時作者提到，這篇論文也可題為：〈支持「台灣文學」之觀念〉—For the Concept of Taiwan Literature。）但是，針對論述中的某些觀點，他也提出批評。唐小兵認為，「台灣文學」作為一種新國族意識與認同的象徵，一方面喚起大眾對國民黨政權施加壓力，實現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它視中國大陸為一個一元化的集權國家，使得「統一這個理念被妖魔化，而對『台灣文學』的追求則毫無疑問地被等同於對自由民主的捍衛」（頁三九四）。最後，作者也指出，「台灣文學」論述是中國現代性重要的一環，但是「台灣文學」史的修正和重構往往複製並凸顯了五四新文學運動背後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他認為除非台灣文學論述採取一種「真正的『後國族主義』取向」，它將無法賦予「本源」和「立場」這些議題以正面意義，而只能「不斷地宣稱自身的獨特性或抗爭的本土傳統」（頁四一〇）。

在文學史方面，牛津大學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牛津當代寫作指引》（*The Oxfo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Writing*）第六章談中國大陸和港台文學，由曾任倫敦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的貝莉（Alison Baily）女士執筆。在十九頁的篇幅裡，作者用五頁來介紹當代台灣文學。她首先說明，港台和大陸由於歷史因素，文學面貌有



海外台灣文學研究期刊 部分以英文撰述的台灣文學研究期刊。(杜秀卿攝影)

明顯的差異，然後以白先勇、王文興作為六〇年代現代主義的代表，以黃春明、陳映真作為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代表。對八〇年代以降的文學，作者認為諷刺小說、黑色幽默和女性議題代表台灣文學的新取向，並以王禎和、黃凡、李永平和李昂為例。從論述框架和作品介紹來看，作者似乎對台灣文學並不十分熟悉。該文僅談小說，對於其他文類毫不觸及。

此外，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應鳳凰新近完成的博士論文著眼於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壇，資料紮實。

## 二、台灣小說

近年來在英語世界裡一件大事當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文學系列，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和齊邦媛、馬悅然、王德威三位編輯委員的策劃之下，已出版了五本

小說英譯本，包括：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鄭清文的《三腳馬》，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張大春的《野孩子》。這樣系統地譯介效果良好。鄭清文的短篇小說集一九九九年於亞洲得到大獎。朱天文同年訪美，受到主流媒體的注意。

評論方面，王德威的〈三個饑餓的女人〉(Three Hungry Women)原發表在《疆界2》一九九八年秋季號，由周蕾擔任客座編輯的「理論時代的中國文學文化研究：重新想像一個學科」專號上(二〇〇〇年以論文集的形式由杜克大學出版)。作者以「饑餓」作為現代文學裡的一個重要原型來探討文學、革命、性別三者之間的張力與互動。論文的重點是饑餓的物質(糧食)和哲學(精神或文化食糧)意涵。透過對三篇作品(大陸作家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張愛玲的《秧歌》和陳映真的〈山路〉)的文本細讀和歷史語境分析，作者指出共產主

義論述的內在矛盾，勾勒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標榜的唯一美學規範）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對話及其中所透露的「饑餓美學」。

在同期專號裡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對王文興的經典作品《家變》提出新解。在論文〈王文興與中國的「失去」〉（Wang Wenxing and the “Loss” of China）裡，作者認為小說裡父親的失去也象徵著（以「孝」為中心的）儒家傳統價值的喪失，它同時表現在作品結構和語言風格的「分裂」（split）上。該文也指出王文興和卡夫卡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主流傳統的邊緣人。而兩位作家的重要差異在於，卡夫卡批判的對象是現代社會裡「個人」的主體性，而王文興批判的是儒家系統裡無法化約的「家」。《家變》的分裂特質——語言、心理、家、中國等多層次的分裂——也暗示著，只有當我們充分體認這樣優秀的文學作品時，我們才不至於被「強加的連續性」（譬如「中國」）所遮蔽（頁一二七）。

唐小兵今年由杜克大學出版的新書：《中國現代》（Chinese Modern），其中第七章的題目是〈歷史之鏡和歷史奇觀〉（The Mirror of History and History as Spectacle: Reflections on Xiao Ye and Su Tong），討論小野的《橄欖鎮1944》和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兩部小說都是對歷史的反思，在技巧和主題上頗有相似之處。它們都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眼睛來看歷史（視覺意象是主人翁主要的認知方式）；在強調不可跨越的時間差距的同時又不禁流露出濃厚的念舊情懷。作者並認為《橄欖鎮1944》企圖在歷史大敘述之外發出一種邊緣的聲音；小野較蘇童更自覺地探索自我身分，這象徵著台灣近年來對自主性的反思和追求。

此外，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麥克亞瑟（Marshall McArthur）完成博士論文《本土化運動以降的「台灣文學」》，探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哥倫比亞大學的陳綾琪和駱赫斯

（Carlos Rojas）兩篇博士論文都涉及台灣當代小說。倫敦大學的卓慧臻（Hui-chen Cho）一九九九年完成有關朱天文的博士論文；林佩吟（Pei-yin Lin）正在從事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牛津大學的賀倫斑（Margaret Hillenbrand）寫作的博士論文研究當代台北和東京的城市文學。愛丁堡大學的雷妮（Carol Rennie）正在從事當代台灣女作家的博士研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浦（Steve Riep）正在進行中的博士論文以台灣五、六〇年代的小說為研究對象。

### 三、台灣現代詩

《現代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前身）一九九六年秋季號是一期現代詩專號，由奚密擔任客座編輯。專號中唯一和台灣文學有關的是奚密的〈變調與全視境〉（Variant Keys and Omni-Vision: The Poetry of Shang Qin），以題目中的兩個觀念作為指標，探析商禽五〇年代以來的作品。「變調」象徵詩人受超現實主義啟發的創作技巧和詩觀；「全視境」則指涉透過這樣的技巧和詩觀，詩人對世俗價值與既定認知觀點（包括語言的禁錮）的超越與生存之真實性的體現。

荷蘭萊頓大學的漢樂逸教授（Lloyd Haft）的新書《中文十四行詩》（*The Chinese Sonnet*）今年在荷蘭出版。其中第七章討論三組現代十四行組詩：大陸詩人鄭敏的〈詩人之死〉，以及兩位台灣詩人（張錯、羊令野）的〈錯誤十四行〉及〈貝葉〉。全書重點是中文十四行詩的節奏、語法和語意結構。在這章裡，作者分析三組組詩如何運用複沓來創造所謂「輝映」的效果，是一篇少有的詩結構的研究。

二〇〇〇年一月號的《中文文學學報》是散文詩專號。其中奚密的〈從超現實到自然詩學：台灣的散文詩〉（From Surrealism to

Nature Poetics: Prose Poetry from Taiwan) 首先概述散文詩在中國的早期發展史，從五四時期的萌芽和最早的中文散文詩集——魯迅的《野草》，到二、三〇年代至抗戰時期這個文類的幾乎銷聲匿跡，到台灣五、六〇年代的高舉拔起。爲了避免重複對商禽的討論，台灣五、六〇年代以紀弦、秀陶、管管等詩人爲例來說明超現實對台灣散文詩的巨大影響和七、八〇年代蘇紹連、渡也等對此現代詩「小傳統」的繼承和轉化。最後，奚密討論劉克襄一九八八年的散文詩集《小鼯鼠的看法》，認爲它呈現了台灣散文詩的另一獨特面貌。八〇年代中以來，劉克襄是台灣自然寫作的重要代言人。他的散文詩所體現的「自然詩學」奠基在這樣的理念上：拒絕以人類文明秩序來規範自然秩序，反之，以自然爲人類生活的指標。它和中國傳統的道家及西方的浪漫主義美學有相似也有相異之處。

荷蘭萊頓大學的馬萊妮森 (Silvia Marijnissen) 正在從事博士論文寫作。她的題目是台灣現代詩中的組詩，主要研究對象是楊牧、羅青和夏宇。

在英譯方面，奚密和 (美國詩人、小說家、義大利文學翻譯者) 史密斯 (Lawrence R. Smith) 合譯的楊牧個人詩集《不見園丁的蹤影》(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Poems of Yang Mu)，一九九八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爲止最全面的楊牧譯詩集。該書按寫作年代分爲早、中、近三部分，集詩一百餘首，並附有詩人生平大事記和奚密的導論。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文學系列也將在今年春天推出一本涵括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的英文選集，由馬悅然、奚密、向陽三位組成的編輯委員會策劃，由近二十位來自歐美、澳洲、香港和台灣的譯者負責英譯，由奚密撰寫導論、詩人簡介和現代詩英譯書目。這本詩選將是目前爲止規模最大的台灣現代詩英

文詩選。在內容上，從一九二〇年代到二十世紀末選五十位詩人，選詩四百餘首。配合這本詩選的出版，台灣和中國大陸也將同時出版中文對照本，相信對台灣現代詩的推廣能起一定的作用。

此外，一本新的個人英譯詩集將在今年和讀者見面。布萊德貝立 (Steve Bradbury) 翻譯的夏宇詩集 (Fusion Kitsch) 將由美國西風 (Zephyr) 出版社推出。夏宇是二〇〇〇年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唯一邀請的漢語詩人。相信這本英譯詩集的出版將吸引更多的讀者。

#### 四、台灣電影

在文化研究的大潮裡，電影一直是學者所關注的對象，堪稱當代顯學。這點直接反映在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中。一九九七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盧小鵬 (Sheldon Hsiao-peng Lu) 主編的《跨國華人電影：認同，國家，性別》(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論文集第二部分以〈港台電影〉爲題，其中有三篇和台灣電影有關。

第一篇是葉蓁 (June Yip) 根據其博士論文所改寫的〈國族建構：台灣歷史和侯孝賢電影〉(Constructing a Nation: Taiwanese History and the Films of Hou Hsiao-hsien) 一文，分析侯孝賢探討台灣認同問題的三部曲：《悲情城市》(1989)，《戲夢人生》(1993)，《好男好女》(1995)。作者認爲這三部作品透過多種視覺和聽覺效果深刻地體現了侯孝賢迥異於傳統的歷史觀：他拒絕大敘述，從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來詮釋歷史；客觀透明的歷史紀錄是不存在的，歷史總已是主觀、當下、個人的詮釋；相對於完整和統一，歷史是片斷、眾聲喧嘩的。

同時收入這本論文集的還有柯瓦立 (Jon Kowallis) 的〈港台後現代電影中的流散：從方育平的《半邊人》來看賴聲川的《暗戀桃花

源》》(The Diaspora in Post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Film: Framing Stan Lai's *The Peach Blossom Land* with Allen Fong's *Ah Ying*)。一九九二年賴聲川執導的頭部電影乃根據他八〇年代的劇場名著改編而成。作者認為雖然在藝術手法上，賴聲川廣泛使用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或譯「距離化」、「疏離」)技巧，並加上并置、反諷、鬧劇等混合手法，頗具後現代效果，但是在主題處理上，並不出五、六〇年代白先勇《台北人》所代表的「流亡文學」類型(頁一七五)。相對而言，香港導演方育平一九八四年的作品《半邊人》以寫實手法處理身在邊緣的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觸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疏離，頗有創意，但卻沒有得到好評。

最後，這本論文集也收入達里歐狄斯(Wei Ming Dariotis)和馮愛琳(Eilccn Fung)合著的〈打破醬缸：李安電影中的流散與失所〉(Breaking the Soy Sauce Jar: Diaspora and Displacement in the Films of Ang Lee)。作者用柏楊著名的隱喻作引子，並對照柏楊和李安對中國文化看法的差異。雖然他們都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但是李安不像柏楊持那麼否定的態度，而相信中國文化有從內部改變的可能。他一九九二到九四年的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所一貫關注的主題是文化的保存和跨文化溝通(或不溝通)，呈現的是個人如何在家庭與社會義務的包袱下彼此衝突和妥協。作者認為李安電影的跨國／跨文化視野提供了一個正面的可能，打破了柏楊的醬缸。

廖朝陽的《借來的現代：〈多桑〉中的歷史和主體》(Borrowed Modernity: History and the Subject in *A Borrowed Life*)最初發表在一九九七年秋季號的《疆界2》「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專號上，由阿里夫(Arif Dirlik)和張旭東任客座編輯，後收入杜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

〇年的同名論文集裡。通過吳念真一九九四年第一部執導的電影來探討激進後現代論述裡「深度」與「真實」的重現及其在當代台灣的政治訴求中的意義。作者認為這部電影是關於如何處理具體歷史經驗所造成的認同分歧的寓言。面對台灣的歷史狀況，擁護對立或昇華性的包容都不能增進我們對它的理解。《多桑》暗示另一種可能：「分裂性的特殊主義」(divisive particularism)不僅僅停留在「多元主義式的包容」的層次，而進而轉化為共同經驗的基礎。如理論家阿萊克(Jonathan Arac)在專號的跋裡所說的，這篇精闢的論文提出一種奠基在非佔有性之「共同訴求」的新政治社群的可能性。

此外，劍橋大學的林松輝(Song Hwee Lim)正在寫作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電影中的同性戀的博士論文。

## 五、台灣戲劇

張惠媛(Huei-Yuan Belinda Chang)的〈「台灣」劇場：政治，意識形態，歌仔戲〉(A Theatre of Taiwaneseess: Politics, Ideology, and Gezaixi)，刊登在一九九七年美國《戲劇評論》四十一卷第二期上。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紹了這個二十世紀初源起於宜蘭的民間戲劇形式。中心論點在於，歌仔戲作為一個文化政治象徵，隨著社會狀況和意識形態的改變而被賦予不同——有時甚至是相反——的意義。譬如，二、三〇年代台灣菁英分子認為歌仔戲粗俗不堪，甚至稱它為「淫戲」(頁一一三)。一九三七年殖民者曾禁止它但卻失敗了，因而改行「日化」政策，包括採用和服和日本音樂。前代歌仔戲演員回憶他們如何「陽奉陰違」：日本警察一走，台上演員就脫下和服，露出下面早穿好的戲服。殖民者的壓迫，加上原本哀怨的「哭腔」，使歌仔戲從「社會毒藥」搖身

一變，成爲民族精神和反抗殖民的象徵。

戒嚴時代的結束意味著歌仔戲的復興。隨著本土化運動的風起雲湧，它從「地方戲」的地位步步高升；進入九〇年代，它已儼然代替京戲（或平劇）成爲新「國劇」，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一九九〇年在北京舉辦的亞洲運動會上，明華園歌仔戲團代表台灣在藝術節演出。作者的結論是，歌仔戲近年來的崇高化清楚地反映了台灣作爲一個國族的自我認同。

蓋南西（Nancy A. Guy）的博士論文：《一九四九以後台灣的京戲和政治》（*Peking Opera and Politics in Post-1949 Taiwan*），和張惠媛的論文相互呼應。她一九九六年在匹茲堡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探討台灣光復以來京戲的政治和文化意涵。簡言之，京戲的提升和官方意識形態是分不開的。「國劇」一詞是一九六五年才開始使用的；大陸稱它爲京劇。國民黨政權一方面壓抑本土文化傳統，一方面全力推動「中國文化」。由於京戲在四九年前即已享有國際聲譽，它理所當然地被國民黨推爲「國粹」的代表。（其中反諷是，在日據時代，京戲在台灣相當受歡迎；台北和台南是當時的京戲中心。一九三七年以後，殖民者禁了所有的本土戲劇，包括京戲在內。）

作者詳細地分析京戲作爲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如何被壟斷（最後一個民間京戲團在一九五三年解散），管制（包括人員的訓練和演出劇目），和運作（傳統文化的象徵，鄉愁的觸媒，中共文革樣板戲的正面對比）。雖然新一代演員力圖革新這個古老的藝術形式，但是隨著台灣和大陸的開放交流及本土意識的新文化主流，京戲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大陸京劇團的高水準暴露了台灣「國劇」的尷尬身分，而歌仔戲的提升導致官方經費的轉移。在政治、經濟、藝術的多重壓力下，一九九五年大鵬、海光、陸光三個軍方劇團解散，部分人員合併成國光劇團，和復興劇團是目前台灣僅有

的兩個京戲團。它們採取新的推廣策略，譬如作電視廣告，到鄉下演出，編寫新劇本等等。力圖走進民間，步出歷史的陰影。

邦茲（Alexandra B. Bonds）的〈關渡 1991：新開始／一個朝聖儀式〉（*Kuando 1991: A New Beginning/A Ritual Pilgrimage*），刊登在一九九六年紐約花環出版社的《劇場新景觀：國際劇場運動》（*New Theater Vistas: Modern M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Theatre*）一書裡。作者一九九〇～九一年在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擔任訪問教授，她的專業是服裝設計。這個機緣使她直接參與了該校遷入永久校址的慶祝活動：三齣戲劇和八個大木偶的遊行。從構想、設計、採購、製作、監督，到實際演出，她都親身參與。作者認爲這是一個「一生難得的經驗」，使她體會到台灣文化裡「傳統的地位」和「儀式演出」的重要性（頁一八〇）。雖然這是一篇個人回顧性的文字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論文，但是作者的第一手經驗爲當代台灣戲劇史留下了一頁有趣的見證。

## 六、台灣散文

散文作爲一個文類，由於它界線的模糊，和英文文學裡的散文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一向在歐美學術研究裡最被忽略。楊明圖（Yang Ming-tu）的〈當代台灣文學中的生態意識〉（*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Taiwan*），收入一九九八年的《自然文學國際索引》（*Literature of Nature: An International Sourcebook*）一書裡，稍稍涉及散文，雖然主題使它必須限於極小比例的作品。九〇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環保意識的普及和提高，與自然生態有關的寫作也增加了。作者將它分爲三類：(1)歷史記載和遊記，包括過去原住民、外國探險家和早期移民的記錄；(2)自然寫作，即描述野生的草木鳥獸蟲魚的



自然誌；(3)生態小說和戲劇；(4)生態詩。每一項下，作者都舉例說明，為英語讀者提供了一個入門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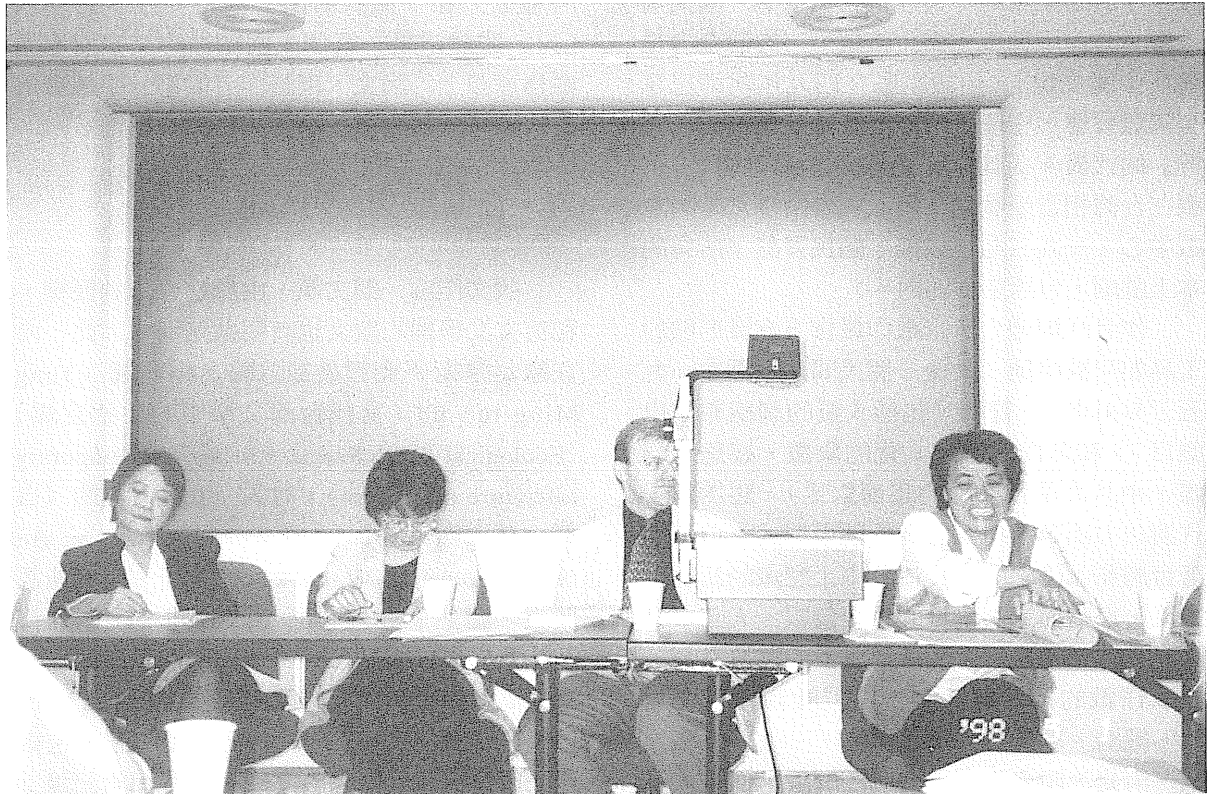
遊記在近年來美國學術界也是一個熱門的研究題目。鄧錦華(Emma Teng)根據其博士論文發表了一篇論文〈女人島：清代台灣遊記裡的性別論述〉(An Island of Women: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刊登在《國際歷史評論》一九九八年六月號上，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和深入的性別研究。

## 七、其他文化形式和台灣文化研究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林亞婷正在進行中的博士論文以雲門舞集為研究對象。這是她

一九九四年碩士論文的延伸。後者討論林懷民一九七八年的經典之作《薪傳》和台灣國族意識之間的關係。

廖炳惠的論文〈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化評論專欄：當代台灣公眾文化裡的全球／在地辯證關係〉(The Case of the Emergent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ns in Taiwan's Newspaper Literary Supplements: Global/Local Dialectic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Public Culture)，收在一九九六年的《全球／在地：文化生產與跨國意象》(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ery) (杜克大學出版社)一書裡。作者的論點是，八〇年代晚期以來，由雙語知識分子執筆的副刊專欄從文學轉移到文化和政治話題，進入日常生活的領域，擴大了公眾文化空間。這個新的論述空間有助於本



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組 在北美的「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組」學術組織每年舉辦年會。(應鳳凰提供)



土知識和外來資訊，在地和全球的相互滲透。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文化評論專欄的「黑暗面」，包括知識生產的商業化，雙語知識分子的教誨意圖和重複論說，以及「反公眾」（頁三四五）的形成。

關於公眾文化的討論延續到廖炳惠在一九九七年的〈後現代文學論述與當代台灣的公眾文化〉(Postmodern Literary Discourse and Contemporary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刊登在《疆界2》「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專號)一文裡。作者認為台灣在新世界秩序中的雙重邊緣化導致它對西方理論的興趣和介入。後現代理論在解嚴後的台灣大盛，隱含了一種「獨特的全球／在地的辯證關係」，強調「從邊緣進行協商的緊迫性」(頁四二)。作者的結論是，台灣的另類後現代狀況，如果從跨國交流(包括移民、貿易、殖民歷史等)角度來理解，更為貼切。

## 八、台灣文學研討會

最後，也應提到和台灣文學研究有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八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王德威教授主持的「書寫台灣：再現的策略」，從歐美和台灣來的二十多位作家和學者，分別以論文和座談的形式，深入淺出地討論了台灣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議題。該會的英文論文集將在美國出版，而中文版已在二〇〇〇年由麥田出版公司出版。

美國的「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組」(Research Group for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已進入第五個年頭。這個學術組織結合了在北美研究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通過年會來激盪思潮和促進交流。年會的形式是由經過公開甄選的研究生提出專題報告，由特約教授作綜合講評。從一九九六年以來，已經舉辦了四次年會。第一屆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第二、三屆在哥倫比亞大學，第四屆在華盛頓大學，第五屆(即二〇〇〇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行。

其他如「美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現改名「中國與比較文學學會」)一九九九年在維也納大學召開的雙年會，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主持的台灣研究工作坊等，均有和台灣文學有關的報告。

## 結論

以上簡單的報告頗能反映近年來英語世界的台灣文學研究面貌。它的涵蓋面相當廣，從書面文學的各種文類到電影、戲劇、舞蹈等多媒體藝術，到文化評論和文學翻譯。(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界限並不是很清楚；它們密切相關，也有互補的作用。)台灣文學研究的發表管道也很多元，從正式出版的學術期刊和專著，到博士論文和研討會報告。此外，電腦網頁和網站可說是最新的傳媒，有助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推廣。

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面的廣度，研究的理論方法也是多樣的。在討論台灣文學時，除了各式各樣的理論(主要是歐美當代理論)，我們也發現學者不僅單就台灣論台灣，也採用比較的角度，譬如對台灣和中國文學——不論是一九四九以前或以後的中國大陸——之間異同的比較。比較的角度不但為台灣文學研究本身帶來新意新解，開闊研究的視野，而且它也意味著台灣文學豐富的相關性。台灣和其他文學文化互相參照的可能是無盡的，有待更多的學者去發掘探索。